

当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及其警示意义

姜正君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 湖南长沙 410006)

摘要: 人类中心主义并非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当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是深藏于人类沙文主义和人体与群体中心主义后面的资本逻辑。资本的扩张性逻辑驱使商品生产、消费模式、技术理性与生态理性日益悖离。如果不能有效调控,资本的无限扩张性和自然的有限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冲突必然引发生态危机。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要利用资本,更要驾驭资本;要扩大生产,更要转变生产;要发展科技,更要掌控科技;要刺激消费,更要导引消费。

关键词: 生态危机;资本逻辑;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15)02-0072-08

Deep root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risis and its implications

JIANG Zheng-jun

(Section of Philosophy Teaching, Party School of Hu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Changsha, Hunan 410006, China)

Abstract: Anthropocentrism is not arch-criminal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risis. The deep root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is the logic of capital behind human chauvinism and human centered and group principle. The expansionary logic of the capital makes goods production,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the rationality of technology deviate from ecological rationality.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unlimited capital expansion and natural ecological system will cause ecological crisis if the contradictions cannot be regulated effectively. The anti-ecology of capital logic has important warning significance for us to advance the great cause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should control the capital as well as use the capital, change the production as well as expand production, contr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develo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ide consumption as well as stimulate consumption.

Key words: ecological crisis; capital logic; anthropocentrism;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最近,央视记者柴静自费拍摄的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火遍全国,一下唤醒了全民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和环境自觉。其实,早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就对生态环境危机敲响了第一声警钟。虽然世界各地的环保主义者、科学家以及政府领导人就一直在寻求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但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并未得到有效治理,有的地区甚至每况愈下,直接威胁到当地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什么人类在解决生态危机方面收效甚微、举步维艰?对此,国内学者借鉴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深入反思,

提出了多种观点,如“人口增长说”、“科技原罪说”、“唯发展主义说”、“消费异化说”、“社会制度说”、“人性贪婪说”、“人类中心主义说”,等等。其中,不少人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当代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人类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从根本上批判和走出人类中心主义^[1]。针对这种观点,也有学者为人类中心主义辩护,认为个体与群体中心主义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人类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真正走入和“重返”人类中心主义^[2]。笔者以为,这些观点没有触及到生态危机的核心和根本,没有达到对生态危机本质的深刻把握,自然找不到解决生态危机的科学之道。

收稿日期:2015-04-01

作者简介:姜正君(1979—),男,湖南安乡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一、人类中心主义并非生态危机的根源
虽然国内不少人都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咎于

人类中心主义，但实际上人类思想史上并没有人类中心主义这种学术流派。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而言，人类中心主义有三层含义^[3]：人类是宇宙的中心；人类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目的；人类总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去解释和评价世界的万事万物。这实际上概括了人类中心主义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三种形态：宇宙人类中心主义、神学人类中心主义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4]。尽管这三种形态内涵差异较大，但都赞成“一切以人为中心，或一切以人为尺度，为人的利益服务，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1]人类中心主义被认为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其理由是“它必然导致自然生活中的人类沙文主义、物种歧视主义”^[5]，从而导致生态环境危机。那么，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宇宙人类中心主义不应为生态危机负责。宇宙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处于宇宙位置的中心，这是人类在蒙昧时期对地球空间方位的一种管见和猜想。早在 16 世纪，它就被自然科学所证伪，现在早已没有了市场。显然，一种被证伪的观念很难推出价值判断——人类沙文主义、物种歧视主义。更何况当代生态危机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副产品，是人类早已知道人类不是宇宙的中心以后产生的。因此，把生态危机归因于宇宙人类中心主义这种古老的观念，从逻辑上和历史上都是说不通的。

其次，神学人类中心主义也不应为生态危机负责。神学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目的”——上帝意志的特殊安排。中世纪有一句名言：没有任何一只麻雀从树上掉下来不是出于上帝的特殊意志。不过，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证明了目的论的荒谬：“假如能够证明任何一个物种的构造的任何一个部分全然为了另一种物的利益而形成，那就要推翻我的学说了，因为这些构造是不能通过自然选择而产生的。”^[6]其实，从神学人类中心主义很难推导出物种歧视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相反可以得出万物平等主义和物种博爱主义，因为按照基督教神创世说和万物有灵说，人类应热爱上帝创造的自然万物，才符合对上帝的信仰。当前，神学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力在基督教国家，而当代生态危机的重灾区却在非基督教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并且现在神学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信徒越来越少，而生态危机却不断升级、

变本加厉。这足以说明，它不应为生态危机负责。

再次，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更不应为生态危机负责。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生态危机开始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发展，人类重新对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反思和考量而提出的一种新型价值观。它的主张有两点：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坚持以人类利益为中心，即在人类利益与非人类利益的关系方面，不否认其他生命物种具有各自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但是人类利益始终高于其他生命物的利益，人类利益最终是处理人与自然生态系统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强调以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中心，即从类的维度看，“人”是“整个人类”，而不是“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从空间维度看，是整个地球上的人类，而不是“个别区域”和“某些区域”的人；从时间维度看，不仅指“当代”人，而且包括“后代”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类利益的优先性、整体性和社会性，是以尊重自然规律和其内在价值为基础的。这从根本上区别于片面强调人的主体性和目的性、盲目推崇人对自然征服的人类沙文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在生态危机产生以后，人类作为诊治生态危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而倡导的一种价值观。当代生态危机发生在先，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出现在后，因此，决不能说它是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就像不能说医生开的处方是患者的病因一样。

综上所述，人类中心主义的三种形态都不是现代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如果把生态危机的罪责嫁祸给人类中心主义，就只会掩盖其真凶，误导生态危机的解决。找出问题的真正根源，是有效解决问题的前提。那么，究竟谁是当代生态危机的真正祸首？

二、资本逻辑：生态危机的真正元凶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人类就开始探求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但时至今日并没有从生态危机的困境中走出来。人类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的劳而无功，说明生态危机的祸根错综复杂，祸首力量异常强大。从共时性来看，生态危机的祸根体系庞大，存在着表层、中层和深层的三重结构。只有由表及里逐层予以剖析，才能挖出生态危机的真正元凶。

1. 表层祸根：人类沙文主义

人类沙文主义是生态危机的表层祸根。生态危机是由人类的实践活动造成的，而人的实践又总是在一定的认识指导下进行的。在一定历史阶段，人类的认识能力和水平受到实践发展水平的限制，总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人不可能洞察和把握自然运动和社会发展的全部规律，在实践中往往只看到事物局部的、眼前的利益，难以预测到人类实践活动所产生的整体的、长远的影响。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必然会造成实践的盲目性，从而最终导致事与愿违、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升级。伴随人的主体性的张扬和资本生产方式兴起所形成的人类沙文主义，无视人类利益的优先性是以尊重自然规律和其内在价值为基础的，片面强调人的主体性和目的性、盲目推崇人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要为当代生态危机负一定责任。

人类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近代形而上学。近代形而上学强调人的主体性，推崇人对自然的改造。从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到洛克主张“对自然界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从笛卡尔提出人要“借助实践哲学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到康德要求“人为自然立法”，“决不能只是让自然牵着自己的鼻子走”，都旨在宣扬一种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观念。近代形而上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高扬理性的旗帜，促进了人的主体性的觉醒，推动了自然科学的空前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工业文明；但另一方面，它无视自然对人的先在性和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割裂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关系，使人的实践活动背离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正轨，滑入了片面追求价值目标而无视客观规律的邪路。在近代形而上学和人类沙文主义的鼓噪下，人类操起工具理性这把利剑肆无忌惮地挥向自然，对其进行无情无理、无度无序的征服和掠夺，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随之发生大逆转：自然从人“崇拜”和“敬畏”的对象降至“征服”和“统治”的目标。

人类沙文主义对自然的横征暴敛和盲目征服，实质上是一种只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利益的不可持续发展观。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对人类沙文主义的近视和愚蠢行为作出过严厉批判。他说：“我们不要

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一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7]383-384}如果说人类沙文主义误导人类盲目改造自然，对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的萌发负有责任的话，那生态危机的爆发就不能苛责于它。因为今天无视人与自然休戚与共的人类沙文主义早已声名狼藉，人类已深刻认识到地球是人类的生命之舟、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8]，应该遵循可持续性、代内与代际公平性原则利用和改造自然。尽管人类沙文主义已被唾弃、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共识，但是当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不断升级，日趋严重。这说明人类沙文主义只是生态危机的表层祸根，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动因。

2. 中层祸根：个体与群体中心主义

个体与群体中心主义价值观是生态危机的中层祸根。当代生态危机表面上反映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即人破坏了自然环境，自然反过来报复人，但实质上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比如，化工企业直接将“三废”排放到周边环境，周边居民每天同这些有害物质“朝夕相处”、“亲密接触”必然会得病。人污染了环境，环境反过来报复人，表面上好像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冲突，其实不然。难道那些排污的企业不知道他们污染了环境，最终会损害他人的身体健康？当然知道。有些企业之所以对政府三令五申提出的环保硬指标，要么敷衍塞责蒙混过关，要么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是因为他们处理“三废”势必增加成本，减少利润。他们这种违法行为，虽然保护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却损害了大多数人的生存利益。推而广之，所有的生态危机表面上好像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转移到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表现。因此，对于生态危机，必须搞清楚谁在环境破坏中受益、谁应该承担环境损害的责任。如果只是笼统地讲“人类破坏了生态环境”、“人类应该对自然界负责”，不仅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有失公平公正的，因为这种说法忽略了不同的人

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差异性,掩盖了某些人犯破坏自然之罪却让全人类担责的事实。

个体与群体中心主义价值观为了局部的、暂时的个体或群体利益,而损害长远的、整体的人类共同利益,对当代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分化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存在着个体利益、群体利益、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迄今为止,现实世界中并没有超越各种利益主体的“类主体”,也不存在脱离各种个体与群体利益的“人类利益”,某些个体与群体打出“共同利益”幌子,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特殊利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奋斗的一切,总是同他们的特殊利益相关,实质上践行的都是个体与群体中心主义价值观。不过,近代以前,个体与群体中心主义并没有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反而一直扮演着人类历史文明前进的重要杠杆的角色。近代以后,它却从文明的“推手”变成埋葬人类的“杀手”,因为社会各种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最大限度地追逐自己特殊的、眼前的利益,举起科技之剑向大自然开战,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丝毫不考虑这种行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长远影响。当这种短视愚昧行为对自然的压榨和盘剥超出自然所能承受的极限时,就出现了生态危机。

个体与群体中心主义伴随人类从古至今,正如恩格斯所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7]³⁸⁵,那为何近代之前人类并没有遭遇严重的生态问题,而直到现代以后人类才遭遇严重的生态危机,并由原来的局部性扩大到全球性呢?显然,个体与群体中心主义并非当代生态危机的关键元凶,其背后还有更深层的物质动因。

3. 深层祸根:资本逻辑

资本逻辑是生态危机的深层祸根。资本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人类社会迈入一个新时代,它帮助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的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为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发展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资本所创生的世界是一个文明与野蛮共生、自由与奴役相伴、进步与退步并存的世界,因为资本具有双重逻辑,即创造文明的逻辑和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资本创造的辉煌文明并不能掩盖它不断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贪婪本性和扩张性逻辑。资本与生俱来

就具有“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止境的和无限制的欲望”^[9],它“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10]。为实现增殖,资本会不择手段突破一切力量的限制,最后成为谁也无法驾驭的魔鬼。这个魔鬼由人创造,最后反而统治着人,人向它顶礼膜拜。资本逻辑主要是指资本的扩张性逻辑,这是资本本身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般本性,是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

资本的扩张性逻辑包括两方面:扩张性生产和扩张性消费。资本不断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决定了扩大性再生产是其必然选择。为了实现扩张性生产,资本会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把吸盘尽可能地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到处寻找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资本不断榨取各种自然资源,不惜一切进行扩张性生产,虽然造就了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但也导致人与自然矛盾的日益激化。因为资本扩张和经济增长会带来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从而资源消耗也就越大,向自然排放的废物也就越多。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自净能力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承载人类无限的盘剥和践踏,最终“资本的扩张本性”与地球有限生态系统之间必然会出现矛盾冲突”^[11]。

资本的扩张性生产逻辑决定了扩张性消费逻辑。资本家生产出大量的商品,只有让人们消费掉才能实现利润。如果没有不断扩大的消费,就会出现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所以如何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就成了各国解决供过于求、克服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主要手段。为刺激消费,资本家一方面通过令人眩目的商品广告和意识形态的宣传,诱导人们消费他们并不是真正需要的商品,并且越多越好;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的信用政策、消费政策来帮助人们实现消费意欲。在扩张性消费逻辑的主导下,人们不知不觉地被逼消费、为消费而消费、无节制消费,沦为消费的机器,其消费目的、心理和行为都发生了异化。反过来,消费异化又推动扩张性生产的继续,维系着资本逻辑得以延续。这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生产方式成为资本逻辑得以顺利运转下去而避免崩溃的连环圈,施耐伯格(Schnaiberg)将其称之为“苦役踏车”。“苦役踏车”的生产方式无止境地利用自然资源,无节制地向自然界排放垃圾,最终必然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

资本逻辑主宰下的扩张性生产和扩张性消费

对自然的残酷掠夺和暴虐征战,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但资本逻辑决定了资本家不会牺牲利润而保护环境,因为“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7]386},践行的是个体与群体中心主义价值观,奉行的是不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沙文主义原则。所以,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使环保成本外在化,将危机转嫁给社会大众和子孙后代让他们来偿付,从而造成人类社会代内和代际环境的不正义,当然更多的是造成全球社会的国际环境的不正义。在当今世界经济交往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保护本国利益,往往将“三高”产业和垃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而剥夺了发展中国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经济的权利。“一方面,占全球少数的发达国家人民消耗、浪费过多的自然资源,并制造了大量废弃物,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源剥夺与危机转嫁,占全球多数的落后国家的人民不得不承受更多的环境危害。”^[12]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山清水秀、绿树成荫,而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却浓烟滚滚、“三废”横流。他们所实行的这种“生态帝国主义”、“环境殖民主义”政策,实质上是一种“生态掠夺”和“生态犯罪”,本质上与十七八世纪的贩卖黑奴、十八九世纪的商品输出是一致的,都是资本唯利是图、不计后果的本性在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

由此可见,生态危机的真正祸首是深藏于人类沙文主义和个体与群体中心主义后面的资本逻辑。如果把根源仅归因于人类沙文主义和个体与群体中心主义,寄希望于通过认识论和价值观的改变来解决问题,无异于隔靴搔痒。因为人类沙文主义只顾及人类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个体与群体中心主义只顾及人类局部利益而不顾整体利益,实质上同资本逻辑的贪婪本性是一致的,它们只不过是资本逻辑的观念化结果。马克思说过,“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因此,只要存在着资本生产方式,包括人的尊严与价值在内的所有存在物,都将会被迫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需要;只要存在着资本逻辑,不管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坚持的人类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所强调的自然权利与内在价值,都将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想法,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尊重和保障;“只要存在着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以追逐利润为根本目的资本就会使生产、消费以及技术理性发生异

化,以消费为导向的社会类型就会对生态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生态危机就会无法避免”^[13]。

三、生态危机的警示意义

资本逻辑是生态危机生成的内在驱动力。在资本逻辑的操纵下,商品生产、技术理性和商品消费与生态理性日益疏离,推动着生态危机的形成。现在,中国一边享受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红利:GDP近9%的年增长率;一边付出因环境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代价:GDP近15%的年损失率^[14]。这意味着资本逻辑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吞噬中国社会发展成果和阻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恶魔。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①。

1. 要运用资本,更要驾驭资本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2010年GDP总量超过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5]。这是从思想理论层面解释中国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动因,但若从物质生产方式层面来看,则完全可以归功于资本逻辑的利用和发挥。因为改革开放一个重要内容是要为市场正名、为资本开道,充分释放市场各个要素特别是资本的活力。资本能开天辟地、化腐为奇,从一定意义上讲,今天所共享的改革发展之成果和福利都是资本所赐予的。可以说,没有资本的推动,就不会有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物质财富的增加;离开资本的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将会是空中楼阁。不过,很多人在利用资本、享受资本之恩惠时,却忘却了它的趋利性和反生态性。资本是没有人性的,是不讲生态道德的,现在每个人都已切肤之痛地感受到资本所造成的不堪承受的生态环境之殇。

既然资本逻辑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要根除生态危机就只能彻底颠覆资本逻辑。那么,为保护生态环境,能否与资本决裂,建立一个没有资本的世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生态至上,用叫停发展市场经济的办法来改善生态环境、消除生态危机。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在人类现阶段,资本逻辑

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这样的现实境遇中,抽象地谈论颠覆和超越资本逻辑并没有实际意义。就目前中国而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增加社会物质财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6]。发展市场经济就绕不过“资本逻辑”。一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航船不能没有资本的驱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不能背离资本的逻辑而展开。但资本的趋利性和反生态性警示人们,不能完全拜倒在资本脚下,不能任凭资本逻辑的横行肆虐,否则将误入不归之路。既然无法抛弃“资本逻辑”而又要必须摆脱生态危机,就必须在发挥和限制资本逻辑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即既利用资本又限制资本,在充分发挥资本创造文明作用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限制资本的负效应,使资本对生态环境的伤害降到最低程度。

当然,要真正实现生态文明,仅仅对资本限制还是不够的,还得驾驭和超越资本。如果不驾驭和超越它,迟早会被资本逻辑所吞噬。资本是反生态的,只要有它存在的一天,就无法完全杜绝对生态环境的伤害,限制仅仅只能降低伤害的程度。所以,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把利用资本与驾驭资本、超越资本结合起来,走有中国特色的驾驭“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道路,既利用资本逻辑来建设社会主义和消除前资本主义的落后、腐朽的因素,又限制和克服“资本逻辑”追求利润最大化趋向所带来的负效应。驾驭“资本逻辑”的最终目的,在于超越“资本逻辑”。尽管资本在当代中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不能等到它的合理性完全丧失以后,再去考虑超越它。马克思认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那么,“资本的利用与资本的超越也是同一个历史过程”^[17]。

2. 要发展科技,更要掌控科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的快速发展不仅给人类带来了高效率的生产、丰厚的物质财富,还给人类带来了丰富的精神生活、良好的医疗教育条件。但是,科学技术又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给人类带来福音,也能给人类带来痛苦甚至灾难。首先,科技万能的神话会使人类盲目地服从技术意志。当“无所不能”的科技成为人们歌颂的对象、甚至取代耶稣成为新的救世主时,社会就变成一个技术统治的社会,人就变成“单向度的人”。这时,技术的合理性就变成成为统治的合理性,技术的解放力

量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正如莫兰所指出,“这个解放人的科学同时也带来奴役人的可怕的可能性”^[18]。因此,萨顿警告世人,“单靠科学,即使我们的科学比现在再发达一百倍,我们也并不能生活得更美好”^[19]。

其次,科技充当了生态危机的技术推手。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为生产力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虽然它带来了“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20],它制造了大量不可根除的污染和无法挽救的环境灾难。比如,生化技术用人造肥料取代有机肥料、用杀虫剂取代生物治虫、用塑料与化合物取代各种自然的生产资料,给自然环境造成了与日俱增的污染;原子能技术用核反应堆发电取代自然能发电、用核武器取代常规武器,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严重的威胁。更为可怕的是,资本逻辑与科技“情投意合”,以违背自然规律、干扰和扭曲自然进程为能事。资本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在技术理性的激励下加大对生态资源的开发、控制和滥用,导致臭氧层破洞、大气变暖、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严重问题。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就是对人类自身的戕害。虽然资本逻辑对于生态危机具有“原罪”,但科技也充当了“帮凶”。

中国现代化离不开科技的高度发展,而科技又往往会成为破坏生态的工具。这就警示人们:科技是中性的,决非永远正确的,它可以成为正义之剑,也可以成为邪恶之剑,其发展方向并非与生态文明的方向是一致的。人类决不能盲目崇拜科技,必须对科技进行反思、批判、监督和制约。失去了监督的科技,就像失去了监督的权力一样可怕,“一旦科技发展失控,它所造成的后果很可能比政治集权的后果更为严重”^[21]。因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中,对科技的态度应是在大力发展的同时加以掌控和监督。对于人们谈虎色变的转基因技术,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强调两点:一是确保安全,二是要自主创新。也就是说,在研究上要大胆,在推广上要慎重。”^[22]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指明不仅要发展科学技术,还要掌控、监督科学技术,从而使科技最大程度地成为为人民谋福音的有益工具、建设生态文明的强大手段,而不是成为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破坏性力量。

3. 要扩大生产,更要转变生产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

物质财富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离开生产力的发展都无从谈起,所以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23]。不过,很多人把邓小平这句话曲解为“发展经济是硬道理”、“GDP增长是硬道理”,从而把经济发展理解为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体量的增长,即“把蛋糕做大”。这其实是一种经济第一、物质至上、人为物役的“GDP主义”,是一种为生产而生产、为发展而发展的发展观。在这种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和拼资源、拼消耗、拼廉价劳动力的外延扩大式、粗放型发展方式的驱动下,虽然GDP高速增长,但也承受着大自然带来的“不能承受之重”:城市雾霾天气频频来袭、农村庄稼作物减产绝收、江河湖海鱼类逐渐绝迹,等等。中国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不仅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而且严重影响了人民身体健康。如果这种境况得不到及时改观,不但资源环境将难以为继,而且多年来取得的发展成果将被吞噬殆尽,甚至还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

如何才能缓解和消除生态危机,恢复和重建生态平衡呢?有人认为,“人类如果再不限发展,结果只能是加速奔向灭亡”,“没有刹车只有油门的发展无异于直奔死亡”^[21],因为现在人类开发替代资源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不可再生资源枯竭的速度,治理环境污染的速度远远慢于环境污染恶化的速度。虽有点危言耸听,但人类如果不以强烈的责任心拯救地球,那么雷切尔·卡森所写的《寂静的春天》和罗兰·艾默里奇所导演的《后天》,也许真的为期不远了。那就中国而言,是否要限制发展即缩减生产规模、降低发展速度来拯治生态环境、缓解生态危机呢?显然不能。众所周知,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很大,但人均总量却很低,简言之,物质生产发展不是过了头,而是还很不够。十八大报告强调,“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24]¹⁶ 如果通过限制发展来拯治生态环境、缓解生态危机,那么不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无从谈起,而且还将导致国家大乱、社会动荡。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必须解决好生产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事业兴衰、民族存亡。所以,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

的第一要务。”^[25]“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26]。“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24]¹⁸

既然不能通过限制发展来拯治生态危机,而原有的外延扩大式、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又让资源环境难以为继,那么必须在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生产之间作出明智抉择。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7]。这就是说,要继续扩大生产、加快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但又不能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转变生产、科学发展,即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相协调。只有这样,生产才既能服务于当代人、满足当代人的物质需求,又不逾越生态系统承载力的红线,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

4. 要刺激消费,更要导引消费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初动力。马克思说:“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28]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国民经济发展都是“高积累、低消费”,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内需不足一直是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于是,通过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来拉动生产,成为经济能继续保持健康发展的长远之计。因此,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要扬弃传统小农节俭持家的消费理念,引导社会大众树立“敢于消费、善于消费”的现代消费观念。不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加上国家消费政策的刺激,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持续快速增长,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群体开始与国际消费时尚接轨,领导消费潮流。在此情况下,中国传统的崇尚节俭、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正悄然被高档奢侈、提前透支的消费理念取代。有数据表明:“未来5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将会达到146亿美元,占据全球奢侈品消费额的首位”^[29]。虽然,推行消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会拉动内需,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但其危害也是巨大的,整个社会多买、多用、多扔,既消耗大量能源和资源,又生产了成千上万

吨垃圾,造成令人触目惊心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均水、矿物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 1/4,人均生存空间仅相当于美国的 1/15,这样的资源环境显然无法支撑起高消耗的消费生活方式。如果任凭消费主义盛行和泛滥,中国最终会步入自我毁灭的歧途。

那么,如何处理发展经济、刺激消费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关系?理性的选择是,对待消费,既要鼓励刺激,又要积极导引,倡导理性消费和生态消费。具体地说,一是适度消费。引导人们改善消费质量,既要使“吃饭讲营养、穿衣讲漂亮、住房讲宽敞、出行讲快畅”的消费时尚逐步融入大众生活,又要坚决纠正和摒弃挥霍性、攀比性、浪费性等畸形消费现象。二是科学消费。引导人们调整消费的结构,使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协调统一,扩大精神和文化消费活动的比重。三是绿色消费。引导人们注重环保、崇尚低碳,树立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进步的消费行为。

注 释:

- ① 本部分论点得益于陈学明教授的启发,陈教授运用矛盾“两点论”思维提出摆脱生态危机与资本逻辑两难的途径是均衡资本逻辑与生态文明的关系。笔者以为,从矛盾“重点论”来看,对资本逻辑与生态文明的背反关系不能仅仅是平衡与协调,还必须要有所侧重地予以关照,否则生态危机得不到缓解。参见陈学明:《谁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第 595-608 页。

参考文献:

- [1] 余昌谋.走出人类中心主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7):8-14,47.
- [2] 汪信砚.人类中心主义与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12):13-17.
- [3] 哲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1176.
- [4] 汪信砚.全球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108-112.
- [5] 刘湘溶.生态伦理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49.
- [6] 达尔文.物种起源[M].周建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21.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6.
-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99.
-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9.
- [11] 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69.
- [12] 郭琰.从环境正义看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9(2):17-19.
- [13] 詹敬秋.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2(4):64-68.
- [14] 陈中,陈初越.中国呼唤生态文明时代——与中国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的对话[J].南风窗,2005(2):22-29.
- [15]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9.
- [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9.
- [17] 陈学明.生态危机与资本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12(11):4-23.
- [18] 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M].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
- [19] 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陈恒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
- [20] 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M].侯文蕙,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0.
- [21] 王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核心问题[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6(4):37-46.
- [22]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677.
- [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5.
- [24]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5] 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2-06-01.
- [26] 胡锦涛.努力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到新水平[J].求是,2009(1):1.
- [27]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120.
- [2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 [29] 王飞,林晓丽.全球 1/4 奢侈品由中国人买单,买奢侈品如同买菜[N].广州日报,2009-12-22.

责任编辑:曾凡盛